

戴笠與特務處情報工作組織的開展

蕭李居

摘要

軍統局的前身是三民主義力行社特務處，它的成立與1931年12月蔣中正第二次下野有直接關係。蔣中正認為「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是造成他下野的原因，所以蔣中正復出政壇後即於1932年2月29日成立三民主義力行社，並在該社內設立特務處，以解決「無情報」的困境。對蔣中正而言，此時的戴笠只是個情報幹部，並非他滿意的情報領袖人才，一開始是以「試用看看」的態度派戴笠主持特務處。

特務處剛成立時的人員編制與經費有限，戴笠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試圖在全國廣設情報據點，要求情報人員注意有關黨、軍、政、學、工、商等各階層的一切活動。戴笠對情報人員的工作規範也相當嚴格，要求工作態度要具有積極性以及呈報情報要迅速與正確，同時也擬定工作人員信條來嚴格要求工作人員的紀律。戴笠曾以「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來說明軍統局的情報工作，由戴笠開創特務處的組織過程，可知他完全具有這些特質，顯示戴笠不僅有「特工天賦」，也有政治頭腦，因此一開始他會受到蔣中正的青睞。

但是由1940年戴笠呈給蔣中正的情報人員撫卹名單突顯出戰前特務處的問題，即戴笠嚴厲要求積極工作的情形下，超時的工作負擔與長期性的軍事化管理造成業務繁重，因此積勞病故者過多。同時特務處的嚴格信條也未發揮應有的效用，違犯紀律而遭情報機構制裁的殉法者亦不少。

關鍵詞：蔣中正、戴笠、軍統局、特務處

A Study of Juntong's Beginning: Dai Li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ffice of Secret Services

Li-chu Hsiao^{*}

Abstract

Chiang Kai-shek pointed out there're lacking of capable subordinates, efficient organized system and intelligence to make him step down from office the 2nd time in 1931. As acquiring the power again, Chiang established Office of Secret Services (*Teuchu*) in the Society of Practice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s the so-called Blue Shirts Society) to solve his "lacking of intelligence" problem on Feb. 29 of 1932. The Office of Secret Services was the predecessor of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Juntong*). Chiang might not make sure that Dai Li could do a good job or not at that moment, so he offered only limited resources of staff and budget.

Dai, however, tried to build the network of intelligence, and to require his staff to do the best they could, so made the staff infiltrate the majority of the Kuomintang units, the government offices, the Army,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by degrees. Dai also asked himself and his staff to be absolutely loyal to Chiang. For these reasons, Dai showed that he was not only a talent person about intelligence but also with a clear political sense, so he could obtain Chiang's great appreciation quickly.

According to the list of being consoled and compensated in 1940, it was clear that there were certain problems in the practice of Office of Secret Services even for latter *Juntong*. These problems included heavy work and severe military management for members, and made his staff sick or die of heavy duty. However, some of them were died for being accused of undisciplined, so Dai's creed might not be work somehow.

^{*} Assistant Researcher, Aademia Historica.

戴笠與特務處情報工作組織的發展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Dai Li,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Juntong*), Office of Secret Services (Teuchu)

戴笠與特務處情報工作組織的開展*

蕭李居**

壹、前言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局」）這兩個機構是蔣中正掌控的重要情報組織，二者的成立也都與蔣中正有直接且密切的關係。中統局的原始機構是1928年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源於1926年5月蔣中正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時所設，負責調查登記黨員情況，但並非情報組織。1928年2月，蔣中正第一次下野復出後，採納陳果夫的建議，由調查科專司黨務情報蒐集工作，並以陳立夫為科長，此後國民黨內有了第一個正式專職情報機構。¹ 軍統局的前身則為三民主義力行社（以下簡稱「力行社」）特務處。力行社係蔣中正第二次下野復出後，一群擁護蔣中正的黃埔學生於1932年2月底所成立，為國民黨內的祕密團體，其中特務處是由黃埔軍校第六期肄業生戴笠主持。

蔣中正為統合陳立夫與戴笠各自的情報系統，1932年9月於軍事委員會成立調查統計局（並非前述之軍統局），以陳立夫為局長，陳焯任副局長，下設三處，第一處長徐恩曾，專管黨派調查；第二處長戴笠，負責軍警調查；第三處長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修改意見，收穫良多，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2年3月14日；通過刊登日期：2012年6月30日。

** 國史館助修

¹ 張國棟，〈中統局始末記〉，收入徐恩曾等著，《細說中統軍統》（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81年6月），頁1；馬振犢，《國民黨特務活動檔案大解密》，上輯（臺北：靈活文化，2010年12月），頁38-41。

丁默邨，主管郵電檢查。但陳立夫與戴笠的情報組織仍是自成一系統，並各自活動，在指揮上陳立夫對戴笠有名無實，調查統計局實際上僅成為一個匯報機構。1938年8月，調查統計局改組，三處分立成三個情報組織，第一處業務與人員移至國民黨中央黨部，成立中統局，局長朱家驊，副局長徐恩曾；第二處擴大升格為軍統局，局長由侍從室主任賀耀祖兼任，戴笠任副局長；第三處成為軍事委員會特檢處，仍由丁默邨負責。不久丁默邨投靠汪政權，郵電檢查職權經中統局與軍統局的爭奪，結果由軍統局負責。² 戴笠雖是軍統局副局長，但整個軍統局組織與情報工作實際仍是由其主導與負責。³

戴笠一生對蔣中正極為忠貞，1943年4月1日他將「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與「唯有蔣委員長，才能領導中國革命」等列為軍統局「四一大會訓條」。⁴ 對戴笠而言，「信仰領袖、效忠領袖、服從領袖」是他畢生拳拳服膺的鐵則，並常用以訓誨軍情局工作人員。⁵ 有關蔣中正交付的情報工作，他曾總結以「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兩句話來說明，前者是指「貫徹領袖主張，達成領袖意圖，要始終如一，一死不變」；後者是指對於領袖的意旨，「宗旨不變，變法可以變；手段可以變，委曲所以求全，最後還是要達到不變的目的。」

² 王禹廷，〈中國調統機構之創始及其經過〉，收入徐恩曾等著，《細說中統軍統》，頁14-16；張國棟，〈中統局始末記〉，收入徐恩曾等著，《細說中統軍統》，頁1-2；馬振犢，〈國民黨特務活動檔案大解密〉，上輯，頁54-55；胡性階，〈中統沿革〉，收入陶蔚然等著，《親歷者講述：中統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1月），頁22-24。

³ 喬家才，《浩然集（一）：鐵血精忠傳》（臺北：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70年10月），頁159。

⁴ 「四一紀念大會訓條」（1943年4月1日手訂），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講詞與遺墨選輯》（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65年3月），頁403。「四一大會」係因軍統局的前身三民主義力行社特務處成立於1932年4月1日。戴笠曾對軍統局人員說該局「工作開始於民國二十一年」，而將該日期視為軍統的創始日，並在1940年4月1日首次舉行四一大會，慶祝成立八週年，此後軍統局在每年此日都會舉行大會紀念。以上請參閱喬家才，《浩然集（一）：鐵血精忠傳》，頁247-248；徐晉元，〈軍統局每年舉行的「四一大會」概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以下簡稱「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13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頁767。

⁵ 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全集》，上冊（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68年10月），頁262。

他並多次以宗旨此來勉勵部屬。⁶

1946年3月17日，戴笠搭乘專機由青島轉飛南京，因氣候惡劣於南京郊外墜機罹難。6月11日國民政府頒發褒揚令，次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主持公祭，靈堂兩旁有所題：「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績；奇禍從天降，風雲變幻痛予心」輓聯，祭典上亦宣讀蔣中正為其撰寫的祭文：「殞此英賢，心傷天喪，五內俱煎！」⁷ 蔣中正在情報工作方面對戴笠極為倚重，因此對於戴笠身亡一事感到悲傷，並親自主持公祭典禮。

由於情報工作的機密性，加上戴笠的意外死亡，目前有關戴笠與情報組織工作的研究，資料來源多是引用相關人物的口述資料、回憶錄或傳記文學作品為主，例如：喬家才、陳恭澍、沈醉、魏大銘、鄧葆光與章微寒等人的口述資料與回憶錄，偶爾有參考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出版的戴笠全集、講詞與年譜，以及相關專著，甚少有立基於政府檔案或一手史料基礎上的研究成果。因此長期以來坊間多是類似演義性質的文學作品，內容真偽混雜，難以辨明。尤其是1949年後兩岸對峙情勢與美國內部對國民黨失去大陸的爭論，對於國民政府情報組織的問題呈現絕對正面與負面的二分法論述，其中有關戴笠開創情報組織的研究亦缺少理性的探討與分析。另外，在戴笠籌組情報組織與工作方面，有關蔣中正扮演的角色亦少有深入且全面的探討，相關著作多僅敘述蔣中正任命戴笠為力行社特務處長，後續有關情報工作的推動似乎都僅是戴笠一人之力，其中未曾見蔣中正欲成立情報組織的背景及其對於情報組織的態度與想法。

本文擬以蔣中正及戴笠相關的直接檔案資料為主，並以軍事情報局出版品與相關回憶錄為輔，探討蔣中正在1932年祕密成立特務處的原因及其對情報工作的想法，並透過分析戴笠相關演講詞與指示，考察戴笠如何「體念領袖苦心」，將蔣中正的期望與其個人的想法貫徹於情報組織的建立上，藉以重新梳理戴笠籌組情報組織工作的歷史，理解戴笠對於情報工作的想法與認知。惟戴笠的規劃與要求項目甚多，其效果仍應待爬梳其他相關檔案逐一檢視，囿於篇幅及相關檔案資

⁶ 戴笠，〈革命精神與革命技術〉（1944年8月4日），收入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講詞與遺墨選輯》，頁119。

⁷ 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全集》，下冊（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68年10月），頁1063、1067。

料的不足與內容資訊的凌亂，此項議題有待另文探討。

貳、蔣中正下野復出與特務處的成立

戴笠一生為蔣中正從事情報工作，其淵源與胡靖安有極大關係。胡靖安是黃埔軍校第二期畢業，北伐時期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主持密查組，負責在上海聯絡軍校同學蒐集各地軍政情報，呈報總司令蔣中正參考。1927年7月，戴笠跟隨胡靖安在密查組工作，開始投身於情報工作。⁸ 同年8月15日蔣中正下野，據曾任密查組副組長蕭烈回憶，蔣中正離開南京前指示密查組隨同總司令部結束，戴笠經其介紹到上海戒嚴司令部任副官。10月蔣中正由日本回到上海，找回原密查組人員繼續進行情報工作，戴笠才離開戒嚴司令部，回至蔣中正麾下從事情報工作。⁹

1928年1月4日，蔣中正返回南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恢復密查組。因胡靖安奉派赴德國學習軍事，蔣中正任命戴笠為上尉聯絡參謀，負責主持密查組，專司調查蒐集北伐前線軍事情報。¹⁰ 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領導，北伐結束。次年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取消，密查組是否存續，之後中原大戰期間戴笠以何種身分為蔣中正從事情報工作，囿於資料並不清楚。但是戴笠情報組織工作真正的開展則是立基於之後成立的力行社特務處，可以說「主持特務處實為戴笠事業的轉捩點」，並使他開始登上情報事業的巔峰。¹¹ 不過特務處的成立卻是與蔣中正第二次下野有直接關係。

1931年12月15日，蔣中正因粵方壓迫與九一八事變被迫下野，致函國民黨中

⁸ 1941年4月1日，戴笠出席獻劍禮演講時指出：「回憶民國十六年七、八月，我是在總司令部底下做事情。」請參閱戴笠，〈團體即是革命家庭〉（1941年4月1日出席獻劍禮講），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講詞與遺墨選輯》，頁19。

⁹ 蕭烈，〈國民革命軍司令部密查組概況〉，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15卷，頁70-71。

¹⁰ 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全集》，上冊，頁13；國防部情報局編纂，《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上冊（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51年3月），頁1。

¹¹ 張霽芝，《戴笠與抗戰》（臺北：國史館，民國88年3月），頁39、477。

常會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及陸海空軍總司令等本兼各職。¹² 兩天後胡宗南致電表示，「鈞座辭電到鄭，全軍徬徨，立請指示方針，以慰眾望」，並建議「請迅令戴笠同志急組聯絡組，以聯絡各地忠勇同志為目的，為在野時間的領袖與幹部聯絡的惟一機關。每月经費約二千至三千元之數，請指定的款，按月撥發。」¹³ 19日蔣中正回電表示同意，¹³ 並在離開南京回奉化前夕，命令戴笠負責籌組聯絡組。可知聯絡組一事係為胡宗南的建議。

有關聯絡組的性質，依胡宗南的電文似為聯絡各地同志，擁護蔣中正為在野領袖，並作為聯絡機關。不過按國防部情報局出版的相關傳記資料，則是聯絡黃埔軍校學生，團結革命力量，蒐集各方情報。¹⁴ 由於胡宗南與戴笠的關係密切，二人自早年相識後即一直保持友好的友誼與合作關係。¹⁵ 胡宗南向蔣中正推薦戴笠，除了兩人的情誼之外，也應與戴笠曾為蔣中正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歷有關，故該組的任務以後者的可能性較大。可知蔣中正雖然下野但仍預做安排，藉以隨時獲知各方訊息，關注情勢演變。事實上，回至奉化家鄉的蔣中正雖然已無政府職銜，但每日除接見賓客外，也接獲各方來電與報告，其中或許有聯絡組蒐集呈報的情報資訊。¹⁶

12月22日蔣中正出席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開幕式後即離開南京，返回浙江奉化。24日下午與宋美齡敘述自我檢討此次下野之因：

¹² 秦孝儀等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二（臺北：無出版社，民國67年10月），頁159-160。有關蔣中正與粵派的政治鬥爭及第二次下野情形，請參閱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11月）。

¹³ 「胡宗南致蔣中正篠電」（1931年12月17日）及「蔣中正覆胡宗南皓電」（1931年12月19日），〈民國二十年九月至民國二十年十二月〉，特交文卷—親批文件，《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70100-00022-049；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以下簡稱《事略稿本》），第12冊（臺北：國史館，2004年12月），頁474。

¹⁴ 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全集》（上），頁20。

¹⁵ 馬振犢，〈試論戴笠在國民黨內的人際關係〉，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民國人物與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9月），頁240-241。戴笠將聯絡組的總部設在南京雞鵝巷53號，此處係第一師師長胡宗南的南京辦事處，由胡宗南借給戴笠使用。

¹⁶ 有關蔣中正於1931年12月底至1932年1月接獲來電與接見行程，可參閱周美華編註，《事略稿本》第12冊與《事略稿本》第13冊（臺北：國史館，2004年12月）。

此皆余一人之過也。余之過有二：一在不能自主，而遷就于人。始則遷就老者，以致對俄國、對左派皆不能貫徹原定主張。再則遷就胡孫，以致招垢納汙，濁淆黨政，不可嚮邇，不可收拾。二在不能用人，而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遂至外交派唐紹儀、陳友仁、伍朝樞等，勾結倭寇以賣國，而余未能預知。陳濟棠勾結左桂各派，古應芬又利用陳逆，不來謀我，而余初猶不信。主義未能深入心，教育仍操于反動者之手，不能自主。夫余有此二過，其陷于內外夾攻之境亦宜也。¹⁷

蔣中正的自省明白地指出本身在國民黨內部形勢的孤單，也就是這種「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的孤獨情勢，使他認為在所謂革命事業中只能一人孤單地奮鬥，結果才會陷入內外夾攻的境界。

這個的檢討內容顯示蔣中正對於無法完全掌控國民黨組織機能的不滿。事實上，在北伐後期蔣中正就對國民黨黨機器的鬆弛渙散有不良的印象，而這次的失敗即讓他產生另外建立一個效忠於他個人的幹部隊伍和組織機構想法，¹⁸ 因為他以為「此後如欲成功，非重起爐灶，根本解決，不足以言革命也。」¹⁹

所謂另起爐灶，中國大陸學者指出，蔣中正認為「最基礎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一支能指揮自如的幹部隊伍和組織機構，以改變自己『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的狀況。」首先，針對「無幹部」的困惑，「經過半年多的反復考察與比較，蔣介石逐步鎖定了自己的核心幹部」，這個名單「主要是原本得到他信任的幹部和一些黨外的知識份子。」其次，對於「無組織」的改變，「CC系在與反派的對抗中，並不能令其滿意」，因此蔣中正在「黃埔學生中建立一個絕對效忠於他的『組織』——三民主義力行社。」最後，關於「無情報」的整合，蔣

¹⁷ 周美華編註，《事略稿本》，第12冊，頁482-483。蔣中正在日記檢討下野原因的文字內容與《事略稿本》所載有所差異，但內容要旨沒有太大差別。請參見《蔣介石日記》，1931年12月22日條，轉引自金以林，〈蔣介石的一九三二年〉，《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臺北：時報，2011年3月），頁231。金以林於文中表示「（蔣中正）在回到奉化的當天，他在日記中總結此次被逼下野的教訓時寫道。」蔣中正係12月22日離開南京返回浙江奉化，不過審查者表示，經查核相關記載確實寫於12月24日。

¹⁸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7月，第2版），頁220-221。

¹⁹ 《蔣介石日記》，1932年1月8日條，轉引自金以林，〈蔣介石的一九三二年〉，《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頁231。

中正在力行社下設特務處，不過「此時他對情報工作的要求，已不僅僅是針對中共，而是擴大到全社會，特別是針對國民黨內的反對勢力。」²⁰

前述力行社的成立主要係蔣中正下野檢討後的需求，但也是因適逢黃埔學生滕傑與賀衷寒等人對於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的危局感到憂心。滕傑認為「能真正接受蔣公領導者只有黃埔嫡系部隊」，因此草擬一個救國計畫大綱，籌劃在國民黨內建立一個擁護蔣中正的革命核心組織，「由核心組織來動員全黨，然後再由黨來團結全民，動員全民，方能對日作戰。」²¹ 同時據力行社發起人之一的干國勳也表示：「九一八事變前後的中國，外有強鄰壓境，內有共黨作亂，軍閥割據，國勢岌岌可危。接受黃埔教授之部分留日學生，身居敵國，目睹時艱，滕傑等乃祕密策劃，思有所挽救，適民國二十一年蔣委員長復出，為負起救國建國重責，期以復興民族，乃接納滕（傑）等建議，倡導民族復興運動。」²² 因此當蔣中正於1932年1月下旬重回南京後，即以這群黃埔學生為骨幹，於2月29日成立力行社，下設總務、組織、宣傳及特務等四處，其中特務處即由戴笠負責主持。²³

關於力行社組織的性質與目的，蔣中正在成立前的2月21日曾說：「余必欲組織一祕密奮鬥之機關，該機關人員必人盡其才，個個有力，而足以控制全國。如手足之於頭目，血氣息息相關，方得完成革命。」²⁴ 成立後的4月7日也告誡自己：「在核心組織未穩固以前，不宜掌握政權，故目前廣求俊彥固我核心可也。」次日更指出：「求賢才而不得，且先建立一團體，聚集余所已知之人才，以漸漸招來未知之人。」²⁵ 可知蔣中正組織力行社的目的在於求賢聚才，進一步

²⁰ 金以林，〈蔣介石的一九三二年〉，《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頁231-241。

²¹ 蔣京訪問紀錄，《滕傑先生訪問紀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82年11月），頁13-18。

²² 干國勳，《三民主義力行社與民族復興運動》（臺北：出版社不明，民國75年8月），頁3。

²³ 周美華編註，《事略稿本》，第13冊，頁311。力行社成立的日期亦有3月1日之說，不過蔣中正在2月29日日記上記載赴「力行社成立禮訓話一時餘」。請參閱金以林，〈蔣介石的一九三二年〉，《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頁236。另，有關三民主義力行社成立的詳細經過，請參閱蔣京訪問紀錄，《滕傑先生訪問紀錄》；干國勳，《三民主義力行社與民族復興運動》；鄧元忠，《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暨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臺北：聯經，2000年2月）等書。

²⁴ 周美華編註，《事略稿本》，第13冊，頁267-268。

²⁵ 吳淑鳳編註，《事略稿本》，第14冊（臺北：國史館，2004年12月），頁40-42。

期望藉指揮這些人員來掌控全國，一切均能自主。

至於為何在社內另設置一個辦理情報業務的特務處，其實早在蔣中正於1927年第一次下野時，也曾把目光移至組織與情報工作。²⁶ 當他於1928年2月復職兼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部長時，由陳果夫代理部長，在組織部內新成立調查科，交由陳立夫主持。此為國民黨首創的情報機關，主要工作在「側重中共地下組織活動的偵察與防制，及其黨徒的策反與制裁」。²⁷ 但九一八事變後的學生運動及第二次下野的結果，讓他對二陳掌控的國民黨機器感到失望。²⁸

就像美國學者威爾杜蘭（Will Durant，1885-1981）所云：「人性改變歷史，歷史並未改變人性。」當蔣中正於1932年返回南京後，關注的仍然是情報與組織問題。2月17日蔣中正針對去年九一八事變與上個月底一二八事變的日本侵略問題，認為「禦外必先充實內部，而內部之充實，當先辦偵探隊。」關於組織偵探隊的功用，他指出：

組織政黨、澈底革命，必先組織偵探隊。夫消滅內部叛亂、制裁一切反動、監督黨員腐化、宣傳領袖主張、講通民眾情意、強制社會執行。尚書所謂：「明四目達四聰。」周易所謂：「履霜堅冰、防微杜漸。」孔子所謂：「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即偵探隊之組織訓練、指揮運用等方法，當詳為訂定之。²⁹

加上他認為：「情報之重要與其組織之精密，網絡運用之靈巧，實為治國惟一之要件。」³⁰ 說明這次被逼迫下野的經驗讓他體認到統治國家與情報的密切關係。

²⁶ 羅久蓉，〈近代中國情報機構的組織型態與業務開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蔣介石與現代中國再評價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年6月27-29日，頁8。

²⁷ 王禹廷，〈中國調統機構之創始及其經過〉，收入徐恩曾等著，《細說中統軍統》，頁13-14。

²⁸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頁220-221。

²⁹ 周美華編註，《事略稿本》，第13冊，頁225-226。蔣中正在當天日記對於組織偵探隊的敘述文字上略有不同，但意旨相同，參閱《蔣介石日記》，1932年2月17日條，轉引自金以林，〈蔣介石的一九三二年〉，《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頁241。

³⁰ 吳淑鳳編註，《事略稿本》，第14冊，頁125-126。

另外，根據當事人的回憶，力行社成立約一個月後蔣中正曾對力行社幹部說明設立特務處的意義：

現值內憂外患相互交至，不許我們有時間做好訓政工作，政府為了安內攘外，除一面盡可能興辦教育外，最重要的是使政府確能明是非，並消除一切反三民主義革命的惡勢力，而客觀的做好情報工作。因此力行社除了設總務、組織、訓練（按：後來設立）、宣傳等處之外，也要設立一個特務處，辦理情報及特殊而不能以一般法律處理的肅奸肅反工作。³¹

蔣中正的意圖在對力行社幹部演講時說的相當露骨，所謂「使政府確能明是非」，其實就是前述他自省的「不能自主」問題，而要能自主就要排除一切他認為的「反三民主義革命的惡勢力」，同時也要做好情報工作，而在力行社下設立特務處就是在辦理情報與排除其所謂惡勢力的工作。

對此戴笠在籌設特務處組織大綱時也指出，「本處秉承幹事會之意旨、社長之命令，以嚴密之計劃，嚴厲之手段，辦理一切偵察及執行事宜，係一轄〔挾〕制反革命份子之總樞紐也。」³² 所謂「反革命份子」就是蔣中正所指的「反三民主義革命的惡勢力」，可以說戴笠完全明白蔣中正用心，在籌組特務處時就清楚指明該機構的性質在為蔣中正進行偵查情報與肅反工作。

可知蔣中正成立特務處的目的是組織偵防，監督黨內活動、排除異己勢力，避免重陷未能預知各方對其不利的動態，並進一步強化控制，為未來掌控權力做好基礎與準備。簡言之，力行社的設置是為了解決蔣中正認為「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的問題，其中賦予了特務處有關情報工作的功能，就是在解決「無情報」的困境。

³¹ 千國勳，《三民主義力行社與民族復興運動》，頁201。

³² 「特務處組織大綱」，〈特務處組織工作開展〉，《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148-010200-0007，頁40。

叁、特務處的組織架構與經費

1932年2月29日力行社成立，此後蔣中正分別於3月3、6、8、14、16、21、24、28日與力行社幹部們談話，平均3-4天即一次，³³ 說明他對力行社的期望相當高。4月之後蔣中正開始關注整理情報組織工作的問題，在3日自我要求說：「余於俄法兩國革命史與國際情報學非速看不可。」之後勤於閱讀吸收情報學知識，21日閱覽《各國情報活動之內幕》後說：「此編閱之手難釋卷，其恨看之不早也。」次日更指出：「此編為余近今最愛看之書，以此書為從政者最要之書，余觀之得益非淺，今日欲窮一日之力閱之終卷。」³⁴

在力行社成立之初，蔣中正先是派桂永清擔任特務處長，但是桂永清以情報工作非其所長，以及兼任軍校附設軍官訓練班，辭去特務處長一職。不久蔣中正改派戴笠接任，並對力行社書記滕傑說：「我看戴笠有調查天才，你們試用看看。」³⁵ 不過此時蔣中正卻仍苦於沒有滿意的情報領袖人才，4月13日考慮特務組織人選，「決以徐恩曾、陳希曾、戴笠、鄭介民、竺鳴濤為幹部，蔡勁軍亦可入選。」20日也感慨說：「余苦思焦慮欲求一人為情報主任，而與之商定情報組織，迄未得其人也。」³⁶ 可知對蔣中正而言，此時的戴笠應只是個情報幹部，而非他心中認為能真正統領情報機構及討論情報組織的領袖人才，指派戴笠接任特務處應只是姑且試用的心態。

雖然如此，但蔣中正仍努力不懈地整理情報組織，除了多次與陳立夫商談情報組織問題，³⁷ 也積極籌劃特務處組織架構與工作內容，召見戴笠與康澤談話，

³³ 請參閱周美華編註，《事略稿本》，第13冊，頁343、362、376、433、443、466、490、506。

³⁴ 吳淑鳳編註，《事略稿本》，第14冊，頁18、127。

³⁵ 蔣京訪問紀錄，《滕傑先生訪問紀錄》，頁22；千國勳，《三民主義力行社與民族復興運動》，頁159；喬家才，《浩然集（四）：海隅叢談》（臺北：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70年10月），頁491-4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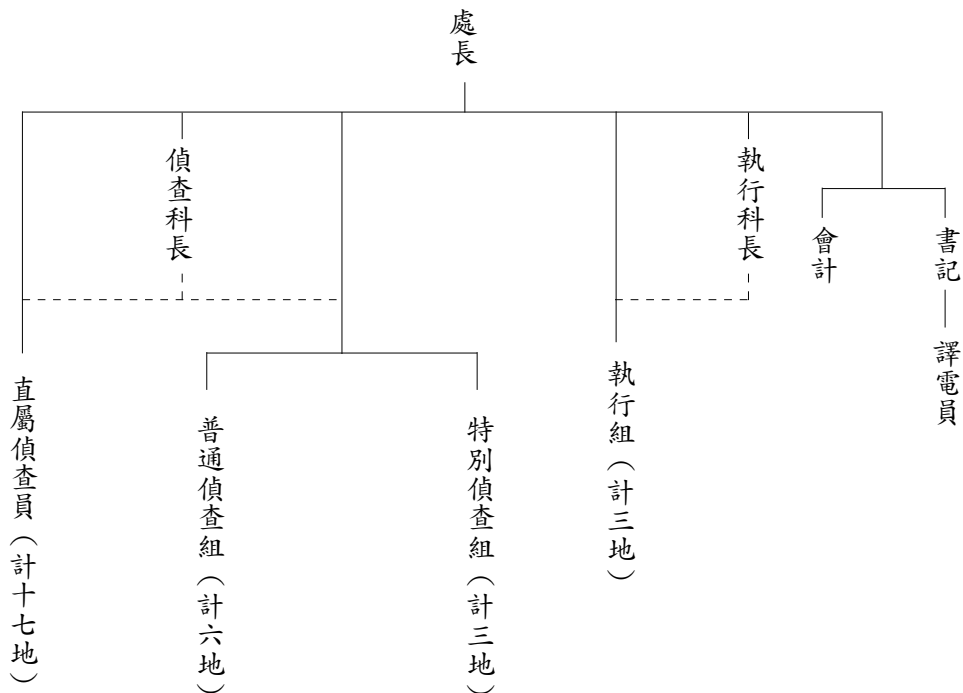
³⁶ 吳淑鳳編註，《事略稿本》，第14冊，頁79、123。不過在蔣中正在4月19日日記是說：「期得一人為情報領袖，與情報組織總未得其人也。」參閱《蔣介石日記》，1932年4月19日條，轉引自金以林，〈蔣介石的一九三二年〉，《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頁242。

³⁷ 吳淑鳳編註，《事略稿本》，第14冊，頁133、214。

修正各地特務組織（4月9日）、研究情報組織（5月2日）及擬定情報網地點（5月27日）。³⁸

而戴笠也在配合蔣中正的意志與想法下積極籌劃相關工作，為特務處的組織架構與工作規範逐步奠下基礎。如前所述，戴笠指出特務處是「轄〔挾〕制反革命份子之總樞紐」，所以情報人員應深入各階級與各職業之中才會有成效，但因組織初創，人選不足，「故第一步暫專注意於有關政局之一般的調查」，³⁹ 因此所擬訂的計畫都是執行第一步工作所採取之標準。

表 1、特務處組織系統表（1932年4月）



資料來源：「特務處組織系統表」，〈特務處組織工作開展〉，《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148-010200-0007，頁43。

³⁸ 吳淑鳳編註，《事略稿本》，第14冊，頁44、207、514。

³⁹ 「特務處組織大綱」，〈特務處組織工作開展〉，《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148-010200-0007，頁40。

由表 1「特務處組織系統表」所示可知，特務處草創時期的組織架構包括以下四大部分：

（一）處本部

處長 1 人，處理處內全部事務。

科長 2 名，分司偵查與執行。前者協助處長考核及指導全體偵查組與偵查員活動，並復核一切偵查案件；後者協助處長考核及指導全體執行組與執行員活動，並根據各種偵查案件，擬具執行辦法。

書記與會計各 1 名、譯電員 2 名。

（二）執行組

暫於上海、天津、香港三區分設執行組，各組設組長 1 名，各統屬執行員 5 名，負責執行一切特務處令行案件，偵查一切特殊消息等。

（三）偵查組

分普通偵查組與特別偵查組。

普通偵查組設於全國各要衝地區，包括南京、京滬、武漢、廣州、北平與汴洛等六地，各設組長 1 人，各設偵查員 3-8 名，每一偵查員各認定一種偵查對象，深入其間，求得真相。

特別偵查組設於上海、天津與香港三個地區，各設組長 1 名，分別統屬偵查員 4-11 名，任務同前。

（四）直屬偵查員

於全國各次要地區分設直屬偵查員 1 名，包括太原、石莊、西安、濟南、青島、徐海、淮揚、杭州、蚌埠、安慶、南昌、吉安、湖南、重慶、成都、福州與梧州等 17 個地區。直屬偵查員直接受處本部領導，以該管區域內所有一切為偵查對象。⁴⁰

雖然此時人手不足，戴笠仍在各地均設有偵查員，並規劃在華北天津、華中上海及華南香港設置特別偵查組與執行組，試圖在全國各地布置據點，期望能掌

⁴⁰ 「特務處組織大綱」、「特務處組織系統表」，〈特務處組織工作開展〉，《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148-010200-0007，頁 40-43。

握全國資訊。其中戴笠將華北的重要據點設在天津，在北平僅設普通偵查組，或許是因為天津為華北的商業重鎮，而且有租界，和上海一樣不僅各方訊息豐富，並且將情報據點機關設於租界內，在活動性與安全性上均較有優勢。

依據戴笠的規劃，特務處員額包括處長、書記與會計各 1 名，科長與譯電員各 2 名，組長 12 名、偵查員 52 名、執行員 15 名，直屬偵查員 17 名，共計 103 名，每月生活費、活動費與辦公費等經常費概算約需 1 萬 9,410 元，尚不包括各偵查員與執行員初次出發的旅費與其他臨時費。⁴¹

特務處本部設於南京徐府巷 3 號，另在南京雞鵝巷 53 號設置處長個人辦公室，簡稱甲室。人事方面，以戴笠為處長，鄭介民為偵查科長，邱開基為執行科長，唐縱為書記，徐人驥為會計。12 月增設通訊科，以梁幹喬為科長。⁴²

1932 年 8 月特務處公開成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但僅是形式上隸屬關係，與力行社仍有組織上的關係，⁴³ 不過經費上有了政府機構正式的編制預算。依據現有檔案顯示，1934 年 1 月特務處每月經常費已達 8 萬 1,873.97 元，2 月略降為 7 萬 573.08 元。⁴⁴ 1938 年 8 月特務處升格改組成軍統局，在改組前後的經費可參閱表 2 「特務處 1938 年 5 月至 9 月經常費收支對照表」，在特務處改組前夕，即 1938 年 5-7 月間每月經常費收入是 15 萬 2,158.35 元，改組為軍統局後的 8、9 兩月經常費每月調升為 21 萬 7,035.35 元。但此時每個月的支出均高達 30 多萬元，雖然有週轉金 15 萬元與蘇浙行動委員會積餘款 16 萬 9 千餘元的挹注，但這五個月

⁴¹ 「特務處按月經常費概算書」，〈特務處組織工作開展〉，《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148-010200-0007，頁 53。有關特務處創設時的人員數量，依《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的圖表明特務處初設編制為 145 人，可能是參考良雄《戴笠傳》：「其時特務處全部編制，共 145 人。」而這當中多出來的人數或許包含良雄所云：「稍後增設第三科，掌理通訊，以梁幹喬任科長」，同時也可能包含戴笠個人辦公室的成員。然而本文之組織大綱係經過蔣中正批示辦理，故該處最初之編制應為 103 人。以上請參閱國防部情報局編纂，《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上冊，頁 6、9、13；良雄，《戴笠傳》，上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69 年 7 月），頁 50。

⁴² 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全集》，上冊，頁 22。

⁴³ 良雄，《戴笠傳》，上冊，頁 54。

⁴⁴ 「特務處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份經常特務費收支對照表」與「特務處民國二十三年二月份經常特務費收支對照表」，〈特務處經費〉，《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2333-0002，頁 5-18。

仍不敷41萬8千多元。⁴⁵

表 2、特務處1938年 5-9 月經常費收支對照表

月份	收入	支出	不足金額
5 月	152,158.35	322,112.03	
6 月	152,158.35	314,506.07	
7 月	152,158.35	329,494.73	
8 日	152,158.35	316,365.05	
9 月	152,158.35	345,933.91	
領到週轉金	150,000.00		
蘇浙行動委員會積餘款	169,043.89		
合計	1,209,597.64	1,628,411.79	418,814.15

資料來源：「特務處二十七年五月至九月經常費收支對照表」，〈特種情報—軍統（一）〉，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34-006。

在1938年 5-9 月期間，特務處經常費項目包括生活費、辦公費、購置費、特別費、各區站組經費與各電臺經費，其中占最大宗為各區站組經費，每月均需20萬左右，約占支出金額的59-66%之間。⁴⁶ 該項經費的龐大係因各區站組的數量相當多，在1938年 7 月升格成軍統局前夕，各區、站、組及辦事處、直屬員，加上國際通訊員、軍事通訊員、水陸交通員、監獄、空軍站、特務隊、短訓班、無

⁴⁵ 「特務處二十七年五月至九月經常費收支對照表」，〈特種情報—軍統（一）〉，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34-006。據鄧文儀表示：「初期力行社的經費，僅由蔣公在其特別費項下，每月撥付幾萬元，特務處的預算不過三、五千元。」良雄也指出初期特務處經費「由力行社所補助，每月不過數千元。」然而楊者聖所撰戴笠的傳記指出特務處的經費由蔣中正從特別費用支付，記於復興社帳下，總額每月約20萬元，據說比復興社全部經費高10倍以上，且在1932年冬即提高至80萬元。不過依據官方檔案資料可知，即使在特務組升格改組成軍統局前夕的1938年7月，經常費支出為32萬9千餘元。楊氏的說法未註資料來源，可知過於誇大。以上請參閱鄧文儀，〈戴雨農的時代背景〉，頁12；良雄，《戴笠傳》，上冊，頁54；楊者聖，《特工王戴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2版），頁44-45。

⁴⁶ 「特務處二十七年五月至九月收支分類表」，〈特種情報—軍統（一）〉，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34-006。

線電訓練班與無線電製造所等已有81個。⁴⁷而在特務處草創時期各地執行組、偵查組與直屬偵查員據點則有29個（請參見表1）。這些據點與下屬機構的擴增，說明特務處經費支出的提高與此有關，同時也顯示特務處在短短6年間由一個在祕密社團之下的簡單情報單位，到抗戰初期已發展成一個籠罩全國的龐大情報系統。⁴⁸

肆、戴笠對情報工作的規劃與要求

戴笠在籌設特務處組織架構的同時，也規劃情報工作的內容與工作人員的規範。本節擬以戴笠所擬的特務處工作計畫為主，輔以他的講詞與為軍事學校所編撰的教材加以說明。

初期限於人力不足，戴笠「第一步暫專注意於有關政局之一般的調查」，設定的偵查對象限於國內，包括政治組織、軍隊、商人團體、工人群眾、學生團體、國民黨黨部、政府機關、警察機關等八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組織的對象包含中共、第三黨、國家主義派、改組派、西山派、太子派、勵學社等；軍隊包含陸、海軍官兵與飛機機師。

對於上述這八種團體階層，戴笠也分別擬定各應注意的偵查要點，其中較為重要的包括：注意政治組織的「領袖之能力及慾望」、「內部之派別」與「重要機關之詳細地址」；對軍隊要注意「連長以上官長之姓名、籍貫、經歷、派別、言論、行動及與外界之關係」以及「官兵對領袖之信仰心」；對商人團體要注意「重要份子政治上活動之實況」以及「商會與黨部之關係」；對工人群眾要注意「操縱者之憑藉」、「有無祕密組織」及「工會與黨部之關係」；對學生團體要注意「學生團體內幕之真相」與「操縱者之姓名及背景」；對國民黨黨部要注

⁴⁷ 「特務處二十七年五月至九月各區站組經費分細表」，〈特種情報—軍統（一）〉，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34-006。

⁴⁸ 如後面第肆節所述，特務處在成立後即形成半獨立狀態，相對於力行社方面，戴笠在情報工作上自成一系統，保有高度獨立性，可知戴笠對該處組織運作的專斷。不過有關特務處據點的擴增，目前僅能由相關經費收支表明列的各地據點知道數目，至於在這期間是如何增設擴展，因欠缺相關檔案，故難以明瞭戴笠是如何經營運作。

意「委員之背景及黨部中之派別」、「黨員之派別」及「黨部和政府及各團體之關係」；對政府機關要注意「長官平日之交遊」及「長官與軍人之關係」；對警察機關要注意「貪污或廉潔」及警察對蔣中正的信仰等。⁴⁹ 可知戴笠初期關注的對象置於對國內政治變動會產生影響的團體，特別是會影響蔣中正政治權力的組織。

另外，據學者指出1928年蔣中正第一次下野後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時關注的情報資訊，主要是有關各地地方軍人與國民黨內的情勢，⁵⁰ 而且一般的認知也都認為陳立夫的組織部調查科負責對付中共及政治反對派方面，戴笠的特務處負責獲取軍事情報。但由此件工作計畫內容看來，特務處的偵查對象雖然仍以國內為主，但在一開始即已將目光擴展至全國各階層，包括陳立夫的調查科負責範圍。同時在不久之前蔣中正曾考慮組織偵探隊，「消滅內部叛亂、制裁一切反動、監督黨員腐化、宣傳領袖主張、講通民眾情意、強制社會執行。」⁵¹ 而戴笠亦認為情報人員要「分駐各處，嚴密注意當地一切有關黨、軍、政、學、工、商人員之動態」，如此「分布於全國各階層中，分布愈廣，力量愈大。」⁵² 可說戴笠明瞭蔣中正欲組織偵探隊的期望，在初創時即努力將情報人員分布於全國各地，並要求注意蒐集各階層的訊息，務求偵查力量能夠滲透至全國各角落。

戴笠也規定偵查員每天要向組長報告工作情報、偵查所得及其結果，而各小組與各直屬偵查員每天要向處本部報告一次工作內容。⁵³ 戴笠這個規定主要是在

⁴⁹ 「特務處工作計劃」，〈特務處組織工作開展〉，《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148-010200-0007，頁45-48。檔案原文係寫「政治機關」，但由偵查注意各要點內容可知應是指「政府機關」。

⁵⁰ 岩谷將，〈蔣介石、共產黨、日本軍——20世紀前半中国国民党における情報組織の生成と展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蔣介石與現代中國再評價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年6月27-29日，頁315。

⁵¹ 周美華編註，《事略稿本》，第13冊，頁225-226。

⁵² 戴笠，《政治偵探》（出版地不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民國27年8月），頁2。此書是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為統一各軍事學校政治教材，聘請部外及指定部內各學術專家與負責實際指導者編撰。雖然戴笠於書中稱擔任政治偵探者，但就內容而言，係指情報工作人員。

⁵³ 「特務處工作計劃」，〈特務處組織工作開展〉，《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148-010200-0007，頁49。

要求情報人員工作態度的積極性，以及情報的迅速與確實。因為他認為「特種工作人員一定要自覺、自動、自發、自強，然後纔能達成我們的任務，完成我們的使命。」⁵⁴ 而且對戴笠而言，情報人員的活動大部分是以情報資訊為目的，偵查到好的情報才有意義。至於情報的好壞與價值，他指出：

凡是能夠做到迅速而又確實的，便是好情報；不甚迅速，不甚確實的，便是不好的情報；若是不迅速，或者不確實者，那就簡直不能叫做情報。……情報要在事情發生以前報告，才有價值。不但在事情發生以前而已，還要在我們的情報輾轉到了領袖那裏，一切防範的配備都安排妥當。這事情方才發生，要這樣的情報才有價值。要獲得這樣的情報，當然不容易。最好是能獲得敵人最高幹部的計劃，如果這種計劃不能獲得時，其次只有靠各種零碎的徵候。⁵⁵

所以他要求偵查組與人員每天都要回報，目的就是在要求工作人員積極主動探尋各種人事現象的徵兆，見微知著並正確分析判斷，快速主動回報，才能使情報發揮最大的價值。

據當時人回憶表示，特務處在成立當年即已經開始形成半獨立狀態，此後戴笠在工作上自成一系統，保有高度獨立性。而且此事亦引起力行社成員賀衷寒的質疑與不滿，提出改組的意見，但戴笠對此感到不悅，經滕傑調解後，一致同意特務處對於蔣中正交代的事務，直接向蔣中正負責；對於力行社決定交辦的事項，則必須向該社負責。⁵⁶ 但特務處畢竟一直隸屬力行社，同時也在1932年9月公開成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戴笠照例仍然必須將情報報告分別呈送力行社幹事會與調查統計局，為此戴笠曾以防止洩漏機密為由，於1937年9月電請蔣中正同意只需直接呈報，而不再分送前述兩個上屬機構。⁵⁷

⁵⁴ 戴笠，〈後死者的責任〉（1941年4月1日），收入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講詞與遺墨選輯》，頁14。

⁵⁵ 戴笠，《政治偵探》，頁117-119。

⁵⁶ 鄧元忠，《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暨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頁245-246；良雄，《戴笠傳》，上冊，頁57。

⁵⁷ 「戴笠致蔣中正支電」（1937年9月4日），〈特種情報—軍統（一）〉，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34-001。

至於特務處制裁案件的執程序，已經決定執行制裁的案件先由執行科擬具辦法，呈請核准後，交由所在地執行組執行，執行組在特別情況下，得獨斷專行，處理執行案件。⁵⁸ 而案件是否執行的決定權，在核准層級上有無因重要性而有分級，或者全部都得經由蔣中正批准，目前囿於直接史料不足仍難明確論斷。雖然部分傳記或口述資料曾指出制裁案因重要性的差別，是有經戴笠或蔣中正核准的不同，但畢竟仍缺少直接證據。不過由一份戴笠呈蔣中正的報告可知，在1933年6月上海「楊杏佛案」發生後，戴笠指出「各反動派的重要份子大都避往香港、天津、青島、廈門等處」，「上海行動幾失目標」，因此將對象轉移至申報館經理史量才，呈請對其「嚴密加以制裁，以遏亂萌」。雖然就檔案資料而言，蔣中正並未對制裁史量才一事有任何書面的批示。⁵⁹ 然而由此件史料可間接推測，一是戴笠要制裁類似史量才這種重要人物時，在事前仍然必須取得蔣中正的核准，不能獨斷獨行；二是蔣中正對於制裁重要人物的決策，或許都是以口頭指示，未留下書面批示。

雖然戴笠規定執行案件需要呈請核准，但在1940年11月戴笠曾對軍情局人員訓令：「特工同志之行動，應絕對聽命於上級；案件之執行，重要公務之請示與接洽，均須呈准。」⁶⁰ 此訓令透露出戴笠對於情報人員的行動已難以嚴密掌控，使得這項規定在抗戰前期似乎未被切實遵守。而此實因隨著軍統局組織人員的擴增與抗戰的爆發，造成人事的紊亂。為此戴笠曾於1941年9月致函毛人鳳等人澈底清查人事，指示「本局內外現究有職員若干？兵伕若干？而後確切計算，每月究須經常費若干？臨時費若干？而於軍糧眷糧之領用實物者，現全國內外各單位

⁵⁸ 「特務處工作計劃」，〈特務處組織工作開展〉，《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148-010200-0007，頁48。

⁵⁹ 戴笠所呈的此件報告內容包含5項不同的事項，其中蔣中正僅對於制裁史量才案與杭州無線電製造所經常費預算書案2項沒有批示，其他3項都有書面指示。另，此件檔案僅有月日而未標年代，由檔案內容與楊杏佛在1933年6月在上海被刺身亡及史量才於1934年11月在杭州返回上海的滬杭公路上遭暗殺身亡等資訊，推知應為1933年或1934年，但以後者可能性較大。請參閱「戴笠呈蔣中正報告」（8月18日），〈特務處組織工作開展〉，《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148-010200-0007，頁58-59。

⁶⁰ 「戴笠訓令」（1940年11月6日），收入國防部情報局編，《戴先生遺訓》，第二輯（內部機密文件），頁72。

究竟領有若干？按月如何分配？均須實查，不可有絲毫馬虎。」⁶¹

戴笠除了要求每日要回報偵查的情報外，對於情報人員的紀律也擬定八條信條要求部屬遵守：

- （一）願以服務本處為終身職業。
- （二）願為任務犧牲一切。
- （三）絕對保守祕密。
- （四）絕對不變更意志。
- （五）不畏難、不招謠、不撞騙。
- （六）絕對服從本處命令。
- （七）絕對不玩忽職務。
- （八）本處工作人員對於上開各款一律宣誓接受，如有違反行為，經偵察屬實時，分別按照本處工作人員獎懲條例辦理之。⁶²

對於前述這些工作成果與紀律的要求，戴笠採取糖飴與鞭子的方式，擬定「特務處工作人員獎懲規則」，明確各項表現或過失而給予獎懲。在獎勵方面，規則列舉九款事蹟表現，但卻只表明「呈請核給獎金」，並沒有獎金的標準。至於懲罰方面，首先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分別開除與察看或懲處：

- （一）考績結果成績不及格者。
- （二）偵查報告含糊而不切實者。
- （三）不照限期報告者。
- （四）有新事實發生，該管區域內之組長或直屬員不立即報告者。
- （五）工作上有困難，事先不請示，而事後飾辭推諉者。
- （六）有不努力工作之事實者。
- （七）臨事畏難者。
- （八）不能實行命令者。

⁶¹ 「戴笠致毛人鳳等函」（1941年9月9日），收入國防部情報局編，《戴先生遺訓》，第二輯（內部機密文件），頁124。

⁶² 「特務處工作人員信條」，〈特務處組織工作開展〉，《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148-010200-0007，頁44。

- (九) 與同事發生意見而意氣用事者。
- (十) 同事有過失明知而不檢舉，故為掩飾者。
- (十一) 招搖撞騙者。
- (十二) 貪污或徇私者。
- (十三) 玩忽職務致妨礙本處工作者。
- (十四) 假公濟私，希圖陷害同事者。

再來是有下列各款之一者處死刑：

- (一) 有企圖背叛領袖之表現者。
- (二) 假公濟私或臨難畏縮，致工作完全失敗者。
- (三) 偵查或執行錯誤，致釀成不幸事端者。
- (四) 洩漏本處祕密者。
- (五) 通敵或有損害同事生命之企圖者。⁶³

1937年7月，戴笠奉命將加薪及撫卹辦法列入獎懲條例，重行增刪修正「特務處考績獎懲條例」，經蔣中正核准交林蔚與陳立夫核辦。新條例詳列考績評比及獎勵與懲戒的標準，其中獎勵分為五級，包括有嘉獎、記功、休假、獎金及加原薪15%；懲處則分六級，分別是申誡、記過、罰原薪（一次）20%、減原薪15%、停職查辦及處死刑，⁶⁴ 在考核與獎懲標準上已較舊獎懲規則公平及清楚。

在前述八條信條中有關「終身職業」的要求，據曾任特務處科員李邦勛指出，蔣中正親筆寫過一張條子給戴笠，內容大意是：「凡從事特種工作的人員，違犯了紀律者，沒有撤職、辭職、請長假……只有記過、禁閉、殛刑。有功者記功、獎金、加薪、晉級。」因此戴笠以情報工作為終身職業訓勉部屬說：「參加了我們的工作，就要嚴守我們的紀律，我們的同志，只有生死問題，沒有去留問題。」⁶⁵ 而曾任武漢區第二組組長鄧葆光也曾說：「經過正規手續加入特務機關

⁶³ 「特務處工作人員獎懲規則」，〈特務處組織工作開展〉，《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148-010200-0007，頁50-51。

⁶⁴ 「戴笠呈蔣中正報告」（1937年），〈特種情報—軍統（一）〉，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34-002。

⁶⁵ 李邦勛，〈軍統局的前身復興社特務處〉，收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13卷，頁437。

後，不准脫離、不准請長假、不准辭職不幹。」⁶⁶

然而在最初1932年實施的獎懲規則中分別有所謂「開除與察看或懲處」以及處死刑的懲罰方式，不過1937年新擬定的考績獎懲條例的六項懲處卻已無「開除」方式。顯示戰前特務處工作人員的懲處方式尚有「開除」一項，而新條例之所以會取消，或許與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日戰爭正式開打有關。不過「開除」方式卻與要求宣誓接受的「終身職業」信條互相矛盾，因此「開除」方式在戰前是否曾經執行，即只是徒具形式，或是「只有生死問題，沒有去留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的考證。

其他各項信條的要求，係因戴笠認為「從事這種（情報）工作的人，原來就是犧牲自己，拯救他人，為最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一定要有始終如一，至死不變的認識與決心，然後才能擔當這種艱鉅的任務。」⁶⁷ 因為「犧牲的決心，就是成功的先決條件。所謂成功，即是因為人類有為國奮鬥犧牲的精神。」⁶⁸ 而且從事情報工作，除了「有強健之體格，豐富之常識，機警之天資，透澈之判斷力及優良之技術」，先決條件是應有「確切之信仰與堅決之意志」，因為若無信仰與意志，「小則假造情報，淆惑觀聽；大則與敵為友，陰肆叛變。其為患之烈，有非想像所可及者。」⁶⁹ 至於保守祕密方面，《孫子兵法》有云：「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因此戴笠曾要求部屬「傳遞文件應用鐵箱加以封鎖」，⁷⁰ 以避免情報資訊的洩漏。不過戴笠也進一步認為「祕密的意義，不僅是避免失敗而已，在積極的意義上，更有莫大的效力」，因為「愈看不見，摸不到則愈神祕，其威脅性也愈大。」⁷¹ 這種看法顯示戴笠對於情報工作態度的積極性。

⁶⁶ 鄧葆光，〈軍統領導中心局本部組織及活動情況〉，收入沈醉、康澤等著，《親歷者講述：軍統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1月），頁26。

⁶⁷ 戴笠，〈我們的態度與決心〉（1943年8月30日），收入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講詞與遺墨選輯》，頁94。

⁶⁸ 戴笠，〈犧牲的決心〉（1946年3月10日），收入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講詞與遺墨選輯》，頁139。

⁶⁹ 戴笠，《政治偵探》，頁8、193。

⁷⁰ 「戴笠訓示」，〈司法類（一）〉，《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8-0001-061。

⁷¹ 戴笠，《政治偵探》，頁82。

戴笠之所以如此嚴格要求紀律，是因他認為情報工作人員「肩負非常重大之責任，其一舉一動，無論在公私方面，往往關係整個組織，甚至整個黨國的安危」，因此「不僅在工作上，應遵守團體之『鐵的紀律』，且在私生活方面，亦須受紀律的約束」，其目的在保護本身安全，「促進工作人員之自覺，幫助實際工作之推進」，更在避免無謂的犧牲。⁷²

在戴笠如此嚴厲要求特務處工作人員的同時，也並未忽略為工作人員提供工作與生活的保障。如同蔣中正曾說：「我們一定要真能組織嚴密、紀律森嚴、調查周確、注意撫卹，並表彰為革命而犧牲的一般革命黨員。」⁷³「領袖和黨對於那一個黨員的表彰和他家族的撫養，完全是一種義務。」⁷⁴因此在戴笠擬定的保障辦法，首先是針對工作人員在不違反前述八條信條規範而因公被捕時，特務處應要主動設法將其釋放。這點除了是因為工作關係外，戴笠指出情報人員「以絕對祕密之身份，受獨立組織之指揮」，因此除了「國家之憲法及其本部之紀律外，幾不受任何拘束。」⁷⁴可知戴笠認為特務處人員是超脫法律之外來從事情報工作。但是戴笠同時也指出，「特工人員做事更應恪守紀律，服從命令，不能借特務之名無視法令。」⁷⁵說明戴笠認為情報人員超脫法律之外的前提應是遵從組織的紀律。

其他的保障包括，因公受傷時，由特務處呈請發給醫藥費或提高生活費；因公傷亡時，發給撫卹費；因公受傷而致殘廢不能從事任何工作時，發給休養費，而不能從事相當工作，則發給補助費。⁷⁶除了生活的保障外，戴笠也相當注重工作人員情感的聯絡與士氣的激發。抗戰爆發後兩年，戴笠認為「鑒于今後工作環境日益險惡，工作進行日益困難，欲維繫嚴密之團體固須有嚴格之紀律，但感

⁷² 戴笠，《政治偵探》，頁214-215。

⁷³ 蔣中正，〈革命的心法——誠〉（1933年9月21日，在廬山軍官團講），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一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3年），頁579-580。

⁷⁴ 戴笠，《政治偵探》，頁2、4。

⁷⁵ 「戴笠致黃毅夫感申電」（1939年8月27日），〈司法類（一）〉，《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8-0001-060。

⁷⁶ 「特務處工作人員保障辦法」，〈特務處組織工作開展〉，《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148-010200-0007，頁52。

情之聯絡、情緒之激發，實有甚大之關係也。」因此他於1939年7月「以『我們的家庭』之意義，約集現有員役及歷年死難同志之父母妻兒在渝者，舉行一懇親會」，期望藉此嘉勉工作人員的辛勞及激勵其工作情緒。⁷⁷

不過「特務處工作人員撫卹條例」似乎是在1935年1月12日才經蔣中正批准實施，⁷⁸ 在1940年3月之前，因公死亡而發給撫卹金者只有14人，因此戴笠於1940年4月1日將舉辦軍統局八週年紀念大會前夕，擬具死難者名單，呈請蔣中正給予撫卹。除前述已給卹的14人之外，包括殉難98人、殉職74人、積勞病故115人與殉法51人，共計338人。其中對於殉法者，條例並無給卹的規定，戴笠因「追念前勞，並顧及其遺族之困苦顛連」，呈請各發給特卹800元。⁷⁹ 在這份死難者名單中，人數最多的積勞病故者高達34%，較殉難者28.99%還多，顯示了在戴笠手下工作的辛勞與危險。

若以1937年盧溝橋事變區分，戰前5年期間死難者僅24人，並無殉難者，但積勞病故12人，殉法11人，剩下1人殉職是「因演放水雷不慎炸斃」的實習生。抗戰爆發後殉難98人、殉職73人、積勞病故103人、殉法40人，在短短不到3年的戰爭期間死難者即高達314人，占全部死難名單的92.89%，說明戰爭對情報人員生命威脅的嚴重性。其中殉職73人多為被日本飛機炸斃或射殺，甚至有「敵機襲渝，在辦公室被炸斃」、「在總台服勤被敵機炸斃」，以及「敵機襲渝，奉命出巡，在西四街雨春公寓門前炸斃」者，此點或許是因戴笠曾下令「在警報下，本局不准停止工作，國難至今，我全體同志，應激發天良，勇於負責也。」⁸⁰

⁷⁷ 「戴笠呈蔣中正報告」（1939年7月6日），〈訓練類（一）〉，《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7-0001-034。

⁷⁸ 「戴笠呈蔣中正報告」（1940年3月29日），〈特種情報—軍統（二）〉，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35-002。

⁷⁹ 「戴笠呈蔣中正報告」（1940年3月29日），〈特種情報—軍統（二）〉，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35-003。由名單中描述的死亡經過可知，「殉難」指執行任務，在行動中犧牲；「殉職」指辦公期間被敵機炸斃或射殺等；「病故」指積勞成病或罹患疾病不治；「殉法」指違反紀律被槍決。另外，這14個已發給撫卹金的死因及時間不明。

⁸⁰ 「戴笠訓令」（1938年11月1日），國防部情報局編，《戴先生遺訓》，第二輯（內部機密文件），頁49。

另外，積勞病故一事可由工作時間觀察，據曾於當時工作人員回憶表示，特務處全年365天每天辦公，辦公時間是上午 8-12時、下午 2-6 時、晚上 8-10時三次，即白天 8 小時、晚上 2 小時，中間兩次休息時間為用餐與散步時間。而且工作人員並不是每逢週日就休假，係採取每一單位每週每人輪休半天方式，時間是從中午12時至晚上10時，由工作人員各別選定一天，以免影響全部工作。同時對於工作人員是以「集體用餐」與「集中住宿」的軍事化管理方式，有眷屬在南京者每週可准外宿一次，沒有者則不准在外過夜。⁸¹ 也就是說每天工作10小時，每週僅輪休半天，業務量應該相當繁重，工作人員的體力能否承擔將是個問題；而長期性的軍事化管理與嚴格紀律的要求亦讓工作人員持續性地處於精神緊繃的狀態。這種情況對於工作人員造成極大的長期性身心壓力，若面對外界的誘惑似乎反而容易違反紀律。因此由前述死難名單的統計，狹義上戰前並無情報人員是真正因公而殉難與殉職，說明戰前特務處的問題在於業務繁重造成「過勞死」與紀律不彰遭內部組織制裁的人數相當多。

雖然特務處在戴笠的嚴格要求與管理下造成工作人員積勞病故過多，但在戴笠戮力經營下，完全「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同時體現其個人對於情報工作的看法，逐步建立情報組織架構與工作要領等，為日後的發展及升格成為軍統局奠下基礎。

伍、結語

軍統局為蔣中正掌控的兩大情報組織之一，前身是力行社特務處。這個情報組織的成立與1931年12月蔣中正第二次下野有直接關係，因為此次的下野讓蔣中正在自省認為係因「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造成他陷入內外夾攻的處境，而不得不下野的局面。因此蔣中正在1932年初重返南京後，即以黃埔學生為骨幹，於2月29日成立力行社，以解決他所認為的「三無」問題，其中在力行社下設立特務處就是在解決「無情報」的困境。然而對蔣中正而言，此時戴笠只是個

⁸¹ 喬家才，《浩然集（一）：鐵血精忠傳》，頁256；李邦勛，〈軍統局的前身復興社特務處〉，頁438；鄧葆光，〈軍統領導中心局本部組織及活動情況〉，頁26。

情報幹部，但因在其麾下並無滿意的情報領袖人才，故而一開始以「試用看看」的態度派戴笠主持特務處，而後來戴笠在情報工作上的發展與成就則是另一回事。

特務處剛成立時組織架構相當簡單，人員編制只有103名，每月經常費用約1萬9千餘元。但戴笠對情報工作的企圖非常大，在如此有限的人員與經費下，仍試圖在全國廣設情報據點，要求注意有關黨、軍、政、學、工、商等各階層一切活動。同時戴笠對情報人員的工作要求也相當嚴格，除了要求工作態度的積極性、情報的迅速與正確性，更擬定工作人員信條來要求紀律。但由其1940年呈請的撫卹名單可知，戰前特務處的問題在於要求積極工作態度的情形下，每天超時的工作負擔，以及長期性的軍事化管理，對工作人員形成沉重的身心壓力，造成業務繁重而積勞病故者過多；同時嚴格的信條卻未發揮應有的效用，違犯紀律而遭組織制裁的殉法者亦不少。

戴笠曾以「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來說明軍統局的情報工作，他在1932年受蔣中正命令籌組特務處可以說就是以這個宗旨在進行。初創的特務處在許多方面都有蔣中正的意志貫徹其中，這當然是戴笠能領會和體念蔣中正對情報組織的期望與要求。而特務處的工作計畫與紀律要求等當然也包含戴笠對情報人員與工作的看法，像是工作態度的積極性與情報的迅速與確實。若說情報人員「對特工活動要具有非凡的理解和悟性，對領袖人物的心理要善於領會和體念，執行特工任務還要具有主動性和攻擊性等等。」⁸² 由戴笠開創特務處的組織過程，可知他完全具有這些特質，顯示戴笠不僅有「特工天賦」，也有政治頭腦，因此一開始他會受到蔣中正的青睞。至於最後特務處有無解決蔣中正當時「無情報」的感慨，以及戴笠對情報工作的規劃與要求的實質成效，則尚待憑藉一手史料由特務處的工作內容與成果進行分析與檢證，如此才能得到較為客觀的評價，而這也是未來民國史情報作戰學術研究可努力的方向之一。

⁸² 楊者聖，《特工王戴笠》，頁41。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特種情報—軍統（一）〉，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軍事。

〈特種情報—軍統（二）〉，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軍事。

《國民政府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特務處經費〉，典藏號：001-02333-0002。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特務處組織工作開展〉，典藏號：148-010200-0007。

《戴笠史料》（臺北，國史館藏）

〈訓練類（一）〉，典藏號：144-010107-0001。

〈司法類（一）〉，典藏號：144-010108-0001。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13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

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14冊。臺北：國史館，2004年12月。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12、13冊。臺北：國史館，2004年12月。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一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民國73年。

秦孝儀等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二。臺北：無出版社，民國67年10月。

國防部情報局編，《戴先生遺訓》，第二輯（內部機密文件）。

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全集》，上、下冊。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68年10月。

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講詞與遺墨選輯》。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65年3月。

國防部情報局編纂，《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上冊。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51年3月。

二、專書

干國勳，《三民主義力行社與民族復興運動》。臺北：出版社不明，民國75年8月。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2009年7月，第2版。

沈 醉、康澤等著，《親歷者講述：軍統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1月。

良 雄，《戴笠傳》，上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9年7月。

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11月。

徐恩曾等著，《細說中統軍統》。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81年6月。

馬振續，《國民黨特務活動檔案大解密》，上輯。臺北：靈活文化，2010年12月。

張霈芝，《戴笠與抗戰》。臺北：國史館，民國88年3月。

陶蔚然等著，《親歷者講述：中統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1月。

喬家才，《浩然集（一）：鐵血精忠傳》。臺北：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70年10月。

喬家才，《浩然集（四）：海隅叢談》。臺北：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70年10月。

楊者聖，《特工王戴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2版。

蔣京訪問記錄，《滕傑先生訪問紀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82年11月。

鄧元忠，《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暨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臺北：聯經，2000年2月。

戴 笠，《政治偵探》。出版地不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民國27年8月。

三、期刊論文

岩谷将，〈蒋介石、共産党、日本軍——20世紀前半中国国民党における情報組織

の生成と展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蔣介石與現代中國再評價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年6月27-29日。

金以林，〈蔣介石的一九三二年〉，《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臺北：時報，2011年3月。

馬振犢，〈試論戴笠在國民黨內的人際關係〉，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民國人物與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9月。

羅久蓉，〈近代中國情報機構的組織型態與業務開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蔣介石與現代中國再評價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年6月27-29日。